

和田发现“车出之印”驼钮铜印

□ 居麦尼亚孜·图尔苏尼亚孜 郑宜瑾

内容提要:本文从印钮、印文、铸造工艺三个方面分析和田发现的“车出之印”驼钮铜印,参照汉代车马出行图及汉代车马出行制度等资料,得出了“车出之印”驼钮铜印是一枚汉晋时期于阗仿汉印的初步结论。包括“车出之印”驼钮铜印在内的于阗印章、花押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进一步证实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田各民族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创造了融汇东西的多元文化,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文化和田

2024年初,和田一名手工挖玉人在玉龙喀什河河谷阶地的砾石层中,无意中挖寻到一枚驼钮铜印章。这枚疑似汉晋时期的于阗仿汉印一经发现,立刻在新疆收藏界引发关注。

这枚铜印印面为方形,长1.68厘米,宽1.6厘米。铜印通高2.4厘米,重量18.58克。印钮为站立的双峰骆驼造型,骆驼头部与驼峰之间有一圆形穿孔,以便穿绳佩戴于身上。印文为汉文正书阴刻篆书“车出之印”四字,文字清晰可见。

“车出之印”驼钮铜印的发现令人欣喜,它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值得人们探究。

“车出之印”驼钮铜印属于西域印章。说到西域印章,人们不禁想起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北)设立西域都护府,郑吉被任命为首任西域都护。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促进了西域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西域都护府所辖西域各城邦国的主要官员均由汉王朝赐予印绶。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都护府统辖西域四十八城邦国,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工、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共计376人。从而将西域诸城邦首领纳入汉王朝的职官体系之中,表明是汉朝的官员。

汉代官印以龟形、蛇形、桥形等印钮来区分帝王及百官的品级。其中,以动物作为印钮,是新莽政权到西晋十六国时期

春风又绿洹河岸。从空中俯瞰外形如青铜巨鼎一般的殷墟博物馆新馆,门头之上、夔龙纹间,“天邑商”三个甲骨文字熠熠生辉。

殷墟,这座3300多年前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因一系列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关键发现而闻名四海。其中,甲骨文是重中之重。

日前,36片天津博物馆馆藏、与商王武丁直接相关的珍贵刻辞甲骨来到殷墟博物馆新馆,吸引了大批参观者前来一探究竟。

“这是甲骨文发现120多年来,‘漂泊’在外的殷墟甲骨实物首次回乡‘探亲’办展。”殷墟博物馆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馆长赵清荣直言,这些甲骨实物弥补了一直以来殷墟博物馆无王卜辞展览的遗憾。

从策划专题文物展览,到设置数字互动装置,再到开发文化创意产品,甲骨文元素在殷墟博物馆新馆内随处可见。颇具巧思的甲骨文咖啡、甲骨文面条、甲骨文“上上签”饼干等,早已成为游客们争相“打卡”的网红单品。

“吃进嘴里,记在心上,这下真的是‘咬文嚼字’了。”上海游客惠心笑言。曾经“高冷”的甲骨文,正在通过鲜活而多样的方式,为大众所感知、所认可、所喜爱。

作为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甲骨文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从甲骨文、金文,到大篆、小篆,再到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三千多年来,汉字结构始终未变,中华文脉绵延不绝。

作为甲骨文发现地,近年来,安阳围绕“把殷墟甲骨文打造成中华文化新地标”不断探索,让甲骨文“活”起来、“用”起来、“火”起来成为各界共识。古老的文字,正在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新华社记者 袁月明

新华社北京电

的少数民族官印的典型特征。根据《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统计,两汉时期,中央政府颁赐给匈奴、鲜卑、羌等少数民族首领的官印有62方,其中一方为羊钮、一方为瓦钮,其余60方皆是驼钮。

骆驼是古代丝绸之路之上重要的运输工具,为古代丝路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新疆古代居民的喜爱。新疆考古发现的岩画、陶器、泥塑、金器、钱币、丝绸等文物上常有骆驼的图案。于阗在铸造钱币或印章时,也采用骆驼的形象。

“车出之印”驼钮铜印从印钮、印文、铸造工艺上研究分析,它应该是一枚汉晋时期的于阗仿汉印。驼钮体现了地域性和民族特色。

“车出之印”驼钮铜印的印文为汉文。汉文是于阗最早使用的文字,从汉代开始在当地流行。20世纪以来,和田陆续发现了一些仿汉印,于阗自铸的印章明显受到中原印章文化的影响。

民丰县的尼雅遗址出土大量西汉末至西晋时期的汉文简牍,包括精绝王室的往来书信和汉代文书《公羊篇》,证明汉文是当时的官方文字。汉语的推广使用为文化的交流传播奠定了基础。1959年,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一枚“司禾府印”煤精印,时代为东汉(公元25—220年)。此印以炭精制作,呈正方形,桥形钮,印文为正书阳刻篆书“司禾府印”四字,体现了汉代篆书浑厚古朴的特点。尼雅遗址出土的这枚“司禾府印”印章,可以证明汉朝在这里曾设有“司禾府”这一屯田管理机构。它也成为汉代中央政府对新疆设置守,进行农业开发的直接证据。唐朝时期文化进一步融合,于阗实行汉语一胡语双语文书体制,胡汉语言并用,汉语为于阗人所习用。和田地区出土、采集的汉文印章更是进一步证实了汉文在于阗的流行。

中原印章文化对于阗影响深远。目前,和田所发现的汉代印普遍采用方形,而方形印是秦汉以来中原官印的基本形制。从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2至4世纪初佐卢文简牍上的封缄样式中,可以看到中原封印技术传统对于阗的影响。和田发现的唐代印的印面边长多在2厘米

及2厘米以上,与唐朝中原印章的尺寸基本相当,应是受到了中原的影响。和田发现的印章、花押印面上除了有汉字外,还有天马、麒麟、祥云等中国传统吉祥纹样,是于阗受中原传统文化影响的有力证据。

汉印形制的官印流行于西域各城邦国上层人士之间,一时佩戴汉印蔚然成风。为了迎合这一需求,西域诸城邦国出现了很多当地铸造的仿汉印形制的印章。这枚“车出之印”驼钮印章和中原所制汉印形制差别不大,由于文化的差异,西域诸城邦国制作的印章印面基本上只是模仿汉印上的汉字书写,“车出之印”驼钮铜印印文中的“印”字,模仿汉印篆刻,疏忽中篆刻反了。

“车出之印”驼钮铜印印文中的“车出”应是“车马出行”的缩写,也可能是专门的车马管理机构名称。车马在古代文献中是经常连在一起表述的,说到马就包括车,说到车就包括马。车马是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尤其对于长途旅行和物资运输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汉代,车马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无论是皇室贵族,还是普通百姓,出行都离不开车马。车马是出巡、游猎、征战必不可少的工具。

两汉时期是封建王朝的上升期,车马作为身份、财富的象征,车马出行图为权贵所喜爱,在汉画像中极为盛行。车马出行图作为汉代墓室画像的主要题材内容,从西汉中晚期开始出现,盛行于整个东汉,且一直延续至魏晋时期。汉代皇帝和皇室成员常常进行巡游或游幸,以显示皇权、巩固统治。在此类活动中,会有大批的车马随行,以便皇室成员及其随从在各地行宫之间迅速移动。车马“依乘坐方式、车形、驾畜种类及数目、车马饰、应用场合分为许多不同的等级”,不同级别的官员乘用相应的车驾,所谓“授车以级”是也。车马区别身份的功用由之体现。各级官员、贵族、士大夫等上层人士在出行时,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标准使用车马,并且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和礼仪。为了方便官员出行,政府设立了官方驿站和驿道,提供驿马、驿车

等交通工具,并设置了一定的换马站点,以便官员在途中更换疲劳的马匹,保证行程顺利。

汉代的商旅贸易相当活跃,涉及范围广泛。商人需要经常长途跋涉,携带货物进行贸易。为了方便商旅出行,政府在一些重要的商贸城市设立了驿站,提供车马和驿舍等服务,以便商人在长途旅行中休息和补给。汉代建了大量的驿道和驿站,这些驿道和驿站贯穿全国各地,连接了重要的行政中心、商贸城市和交通枢纽,为车马出行提供了便利条件。总的来说,汉代是车马出行制度得到进一步规范和发展的时期。车马出行制度在当时是相当完善和广泛的,为各类人群的出行提供了便利,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后元年复为卫尉。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賁三令丞。”《正义》注曰:“公车司马掌殿司马门,夜微官中,天下事及阙下凡所徵召皆总领之,秩六百石。上述,公车既是一种官职,也是相应的政府机构名称,还是宫门的名称。在汉代,有专门的车马管理机构负责管理车马的供给、使用和维护。特别是对于御马,有专门的御马院进行统一管理,确保皇帝和官员的出行安全和顺畅。官员使用车马出行也须经过一定的审批和安排,不能擅自动用。而普通百姓使用车马出行时,也需要遵守一些交通规则和和安全要求,以防发生意外事故。从这方“车出之印”驼钮铜印可以推测出,于阗也仿照汉制,设立车马管理的机构。官员需要车马出行,须向管理机构申请,钐盖“车出之印”,方可成行。

四

包括“车出之印”驼钮铜印在内的于阗印章、花押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进一步证实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田居民对于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感流淌于血液和灵魂中,中华文明的向心力深入和田的每一寸土壤。和田各民族以开放包容的胸襟创造了融汇东西的多元文化,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约特干遗址还曾出土一件唐代“人首怒像陶器”文物,上半部分是发怒的胡人形象。此人双眉紧锁,怒目圆睁,也蓄着浓密弯曲的八字胡和山羊胡,下半部分已残缺。

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车出之印”驼钮铜印

第三届新疆文化艺术节4月7日启幕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3月28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银璐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获悉:第三届新疆文化艺术节将于4月7日至21日举办。

本届艺术节以“七彩铸同心 喜迎70周年”为主题,由全疆各级文艺院团单位、群众文化单位及部分高校、社会组织参演参展。艺术节共9个部分,包括开幕式即第五届全国油画展、优秀舞台艺术剧目展演、小剧场剧目展演、精品美术展览(陈列展、基层巡展)、优秀旅游演艺剧目展演、文创集市进景区、“传统与潮流的跨次元对话”动漫展与coo-splay 展演、群众文化活动和闭幕式演出秦腔现代戏《红山塔下》。

艺术节采用“主会场+分会场”模式,在乌鲁木齐市设主会场,各地州市设分会场同步举办相关活动。艺术节的优秀舞台剧目展演将呈现新疆近两年创作的多部舞台艺术精品力作,包含话剧《我的布力开》、吟诵剧《岑参·千树万树梨花开》、京剧现代戏《红山塔下》和《时和岁丰——二十四节气主题音乐会》《木卡姆精品荟萃——且比亚特》。

系列展览活动包括陈列展和基层巡展,其中陈列展包括在新疆美术馆举办的第五届新疆油画

奇特饮器讲述丝路酒具传奇

在新疆博物馆隋唐时期展厅里,有一件外形奇特的文物,它的上半部分是面带微笑的人首,下半部分是双耳竖立的牛头,上下有一连通的圆孔,似一件雕琢精致的工艺品。它源自“来通”,是流行于唐代时期丝绸之路的饮酒器具。

来通一词源自希腊语,意为“流出的”,源于人类用动物角制作的酒具。因外形类似兽角,又称“角状杯”,主要用于祭祀和礼仪活动场合。丝绸之路开辟以后,来通传入中国。

新疆博物馆研究员阿迪力·阿不力孜介绍,这件名为“人首微笑牛头陶器”的文物,也被称为陶来通杯,出土于和田县约特干遗址,高19.5厘米,上半部分是一微笑的胡人形象。只见此人头戴高顶螺帽,眉毛弯弯,鼻梁高挺,眼含笑意,上唇蓄有两撇上翘的八字胡,下唇丰满浓密弯曲的山羊胡。下半部分是一个牛头,此牛双耳竖立,眼睛圆瞪,双角弯曲,嘴部撮成一个圆孔。其顶端为注酒口,牛嘴为出酒口。

约特干遗址还曾出土一件唐代“人首怒像陶器”文物,上半部分是发怒的胡人形象。此人双眉紧锁,怒目圆睁,也蓄着浓密弯曲的八字胡和山羊胡,下半部分已残缺。

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从“独唱”到“合唱”

她在国门传播中国好声音

“各位游客大家好,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第一篇章——中华文化。”3月27日,古丽亚·努日不拉提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今天的工作。今年3月3日,霍尔果斯新疆形象展示平台(中华文化体验馆)开馆,27岁的古丽亚成为这里的一名讲解员。她也是霍尔果斯“国门百姓宣讲队”的组建者、《国门故事听我说》的创办者。

大学主修化学专业的古丽亚,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材料工程师。毕业后回到家乡后,她成了一名基层宣讲员,决定用自己在大学期间积累的宣讲经验,做党的惠民政策传播者。

“我发现老百姓对住房、就业等方面的政策需求比较多,就整理了百余条相关政策及解读,用群众易于接受的形式宣讲,收到了良好效果。”古丽亚说。

“一个人的能力有限,要让各族群众了解更多党的好政策,就需要更多宣讲力量。”为突破宣讲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局限性,真正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古丽亚通过霍尔果斯好地方、霍尔果斯云平台及线下组织等多种途径,招募30多名各领域宣讲爱好者,组建“国门百姓宣讲队”,创办线上理论宣讲栏目《国门故事听我说》,将“独唱”变为“合唱”。依托“国门宣讲”品牌,

打造“一元多级”宣讲矩阵,培育了“丝路新声”“马背宣讲”“田园之声”等40多个导向正确、鲜活生动的理论宣讲品牌,让理论宣讲从原本的“单打作战”转变为“集体作战”。

“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必须深入群众之间、走进群众心里,从小事出发,与群众产生共鸣。”古丽亚说。

近年来,“国门百姓宣讲队”依托“国门宣讲”特色品牌,开展各类宣讲活动2000余场次,覆盖群众超10万人。

古丽亚还主动承担起企业的理论宣讲任务,撰写了面向企业的宣讲稿件20余篇,制作发布“青年干部对党说”“五免五减由我讲”等微视频30多条。创新摸索出理论宣讲对象化、分众化模式,打造了面向生产一线工人的“5分钟微宣讲”,针对企业职工的“15分钟微党课”宣讲品牌,并定期组织政治素质好、理论水平高的青年职工、女职工、模範职工组成“流动巴士宣讲队”,深入生产一线开展各类宣讲活动200多场次,覆盖职工2万余人。

“我要给中外游客讲述不断传承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更多中国故事走向国门,走向世界。”古丽亚说。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王新红